

400毫米等降水线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 高洪雷

正如古希腊的小块平原有助于形成天然的政治单位——小国寡民的城邦一样，古代中国广袤的冲击平原也有助于形成庞大的农耕帝国和专制政体。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左右着一个地区的原始文明走向。

按说，优越的地理环境足以让中原百姓倍感优越与幸运。然而，它并未给人们带来预想的安全感。因为，在古代中国西北部，有一条令人寝食难安的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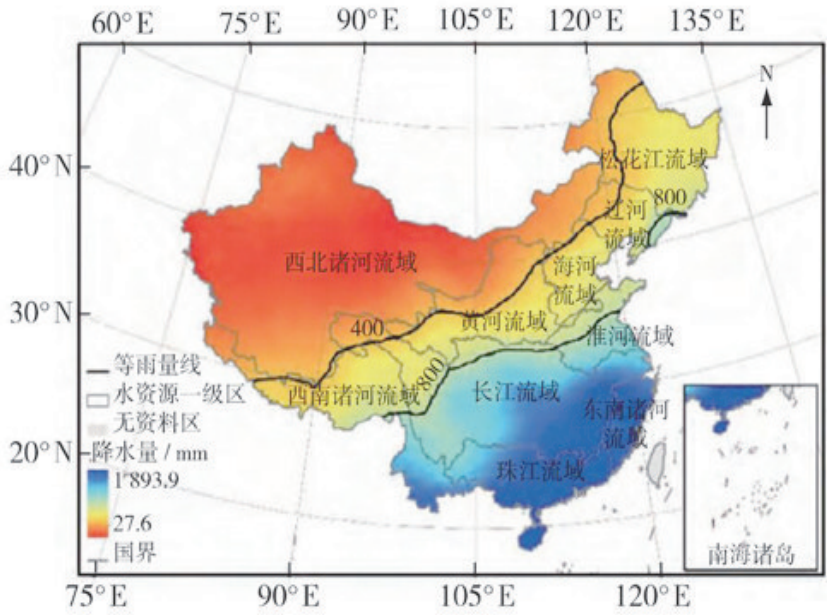
这条线，在中国地理课本上叫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美国学者黄仁宇把它称为“15英寸等雨线”。请打开中国地形图：从中国东北到西南，这条降水量线沿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巴颜喀拉山、冈底斯山，将中国分割为两大区域。线的东南部是季风区，也就是受太平洋、大西洋夏季风影响的区域，年平均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适宜种田；线的西北部由于大山的阻挡，是夏季风吹不到的区域，也就是非季风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下，干燥多风，只能放牧。非季风区尽管也有少量的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但占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游牧经济。因此，这条线就成了半湿润与半干旱区分界线，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分界线，种植业与畜牧业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分界线。

或许有人会说，这条线的两侧，生态环境迥异，生活方式不同，生活资料互补，又有大山的分割，应该能做到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吧？的确，农耕区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秋收，男耕女织，一年到头忙碌而充实；游牧区的牧民逐水草而迁徙，扬鞭放牧，弯弓狩猎，一天到晚豪迈而惬意。每到农闲季节，农民拿出多余的粮食与布匹，牧民取出多余的牲畜与皮货，双方在规定的地点进行交易贸易，各取所需，互通有无，这是一种多么理想、多么祥和的农牧关系呀！但理想一向丰满，现实往往骨感。每当遇到气候干旱、牧草枯

萎、牛羊锐减的年份，非季风区饥肠辘辘的牧民，根本没有多余的生活资料向农民换取救命的粮食，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偷偷闯入季风区，前去盗窃和劫掠通常有半年积蓄的种田人。零星的袭击渐渐扩大为战争，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后发制人。这一根本原因，导致牧民与农民沿400毫米等降水线开始了连亘两千年的血腥战争。边关烽烟和战马嘶鸣，从此成为两侧民众无边的噩梦。

依照一般思维，游牧区是无法与农耕区相抗衡的。第一是经济差距，发达的农耕业与丝织业使得农耕区积累了大量财富，而游牧区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第二是文化差距，中原地区有着先进的文化，而游牧区还停留在原始崇拜阶段，且鲜有文字；第三是体制差距，中原地区极易形成大一统的帝国，这种帝国能动员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参与战争，而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来回游走，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尽管全民皆兵并擅长游击作战，但毕竟难以与农耕区进行正面、持久之抗衡。所以，在秦统一六国之前，草原上并未出现过任何强悍的民族共同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时横扫镐京的犬戎，不过是申侯请来的雇佣军。更为极端的是，赵、燕、秦三个诸侯国，在将边境的游牧部落赶跑后，居然沿着这条线，相继修筑了长城，切断了游牧民进入中原的通道。看来，东南强、西北弱的格局，一时难以打破。

但以上说法，不过是中原人士的一厢情愿罢了。事实上，游牧区并非弱者，他们一直通过两种方法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一是战争，二是贸易，而贸易的成本无疑更低。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竞相与草原部落进行贸易，以便从草原买到战马用于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久而久之，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得草原与内地的贸易达到了一个大致均衡价格，至于那些年久失修的诸侯国长城，就像如今农村家庭的门锁和高墙一样，逐渐沦落为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摆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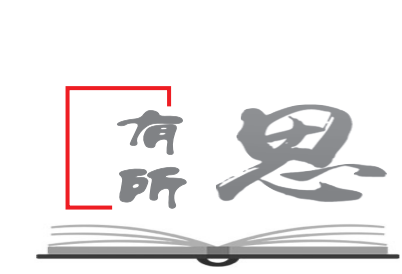
然而，当中原走向统一，自认为能够自给自足的中原王朝，为了统治区的绝对安宁，就会强制关闭原诸侯国与游牧区的边境贸易，继而在边境派驻大量的军民屯田驻牧，甚至屡屡像秦始皇一样不断加高、加固古老的长城，将游牧部落彻底隔绝在所谓的农耕文明区之外。如此一来，草原上那些可怜的小部落，通过战争获取生活资料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要想赢得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小部落必须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于是，强大的游牧帝国出现了。

就这样，从秦代开始，长城两侧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和军事形态。第一种是在中原王朝强盛时期，中原王朝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与兵强马壮的草原帝国在长城一线形成对峙局面，双方你来我往，时战时和，而短暂的和平常常是由中原王朝通过付出财富和女人完成的，如汉 vs 匈奴，西晋 vs 鲜卑，隋、唐 vs 突厥，宋 vs 辽、金、西夏，明 vs 瓦剌、后金等；后一种是在中原政权内讧、衰退时期，游牧帝国趁机越过长城，逐鹿

中原，然后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形成了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统一、融合的多元帝国，如北魏、前秦、北齐、北周、元、清等。

天长日久，由于多元帝国的持续作用，400毫米等降水线的两侧，都划入了中国版图；生活在两侧的人民，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多元帝国治下的长城，已经不再是一道防御性的城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国家之内的两个邻居间的一道篱笆，多数时间是供远方游人浏览与感悟的一道风景，更多的意义则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的人文地标和精神图腾。

战马远去，烽烟已熄，一切都在变，不变的，似乎还是那条绵延万里的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及线上的苍凉奇观。



(上接1版)

《论时代意义》以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新理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论时代意义》不仅高度概括和阐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还充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重要观点，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揭示的一些基本原理的创新和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的生产关系虽然解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但生产关系中还包含有经济管理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内容，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一经建立就可以无限度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思想。《论时代意义》认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要求社会主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必须紧紧围绕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中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主导性位置，首先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后还要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进行改革和创新。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充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大力提高科学技术和劳动资料的水平，不断开发和拓展资源、产品等劳动对象，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在这篇文献中，习近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在所有制不变革的情况下

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样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因此，需要不断改革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不断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扩大了生产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对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困惑和实践难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关于除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革命之外，还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文艺、文化、思想的革命，也都属于社会革命范畴的思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论述的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所引起的社会革命，主要是指社会形态的改变，即一种社会基本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基本制度。在《论时代意义》这篇文献中，习近平同志通过对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对社会革命的内涵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使社会革命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包含各种社会重大变革诸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艺革命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赋予社会革命以新的含义。2018年1月，习近平同志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研讨班上进一步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旦出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自身也有一个不断改革和发展的过程的思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绝不会”的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

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论时代意义》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明确提出新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力未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可以出现的，而且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一经建立，并不是僵化不变的，自身也有一个不断改革和发展的过程。这种理论上的突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生产关系消亡与产生条件的原理。

第四，关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内部影响对方的互相贯通的思想。《论时代意义》这篇文献认为，过去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互相依存、作用、促进等方面，但对两者的贯通关系认识不足。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所有制的构成中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劳动力、劳动资料等生产力因素也都要受到一定的所有制形式的占有和支配，这就涉及生产力的所有制问题。从生产力方面来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中，自然包括研究、协调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的领导和管理科学，从这一意义上讲，生产关系的科学化也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不仅体现在二者的外部，也发生在双方的内部。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始终坚持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来抓，又要着力抓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还要善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部去影响、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从而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同构成要素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

制度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市场经济体制则不具有阶级属性，只是经济管理手段。《论时代意义》这篇文献则更加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正确把握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建设、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既不能把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去单纯发展市场经济，而是要扬长避短，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机结合，发挥合力。在今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书记明确指出，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当前势如破竹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正是这种坚强意志的集中体现。

第六，关于转变经济管理体制与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之间是承前启后、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的思想。转变经济体制是要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是要转变生产力的发展方式，二者实质上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转变经济管理体制能够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清除制度和运行机制上的障碍，而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又能够为转变经济管理体制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内部环境，从而使新旧体制的转换进一步加快。《论时代意义》这篇文献早在20年前就提出需要全面深刻理解两方面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不断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相互推动、全面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宏大背景出发，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定位，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知事几、察物情者，可与谋国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谋身。”所谓“知事几、察物情者”，主要指那些智慧有余而道德不足的人，其所谋越大，则带来的祸患也会越大。也就是说，只有理性意识而无道德意识的人既不可谋国，亦不可谋身，因为“是非之外无祸福焉，义利之外无昏明焉”。

道德意识在《周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对于战略主体而言，如果仅仅有理性意识，而没有道德意识的制约，即使知道事物的几微之理，由此而进行的战略筹划、战略决策，尽管能够取得一时的成功，最终也会走向失败的结局。但是，如果仅仅固守某种道德，而对未来没有理性的认知和清晰的视野，同样不能够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因此，在进行战略筹划、战略决策、战略实施时，战略主体必然要将理性意识与道德意识进行相应的统一，这在易学里被称为“仁智双运”。

所谓“知几”，就是知道事物发展变化的“几微”之处，真正通晓事物“几微”变化的人，也必然是道德高尚的人。《系辞传下》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其知几乎？”预见事物微妙的征兆，按照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做事，可以说达到神化的境界了。君子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往而不谄媚，与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交往而不傲慢，这才算真正知道几微之事了。“知几”属于理性意识，“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属于道德意识，由上下文义可知，“知几”的行为本身已经内蕴有道德意识了。这样，理性意识和道德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就统一了起来。实际上，最高的理性意识本身就是最高的道德意识，反之亦然。如《系辞传下》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穷尽事物微妙之理，把握事物变化之道，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因此，最高的理性意识与最高的道德意识完全统一起来了。

“知几”的理性意识之所以与道德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从战略的长远性来看，行为主体的道德性不一定带来预期的目的，但是，行为主体的非道德性一定会带来灾祸。

《系辞传下》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善不积累不足以成就美名，罪恶不积累到一定程度不

《周易》中的「知几」与道德意识

□ 陈良栋

足以给自身带来灾祸。小人以小善而对自己没有好处而不去行善，以恶小没有坏处而处处行恶，因此，小恶积累到无法掩盖，罪恶大到不可挽救。《坤·文言》亦有相似的观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辩也。”

《易》曰：“履霜，坚冰至。”“履霜，坚冰至”强调的是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微小到显著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在人事上就是“积善”带来好的结果，“积不善”就带来不好的结果，臣弑杀君主，子弑杀父亲，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循序渐进慢慢地发展到这样的结果，其关键在于能不能及早地加以辨别。所谓及早地辨别之事，就是在具有“履霜，坚冰至”理性意识基础上，认识到“善”可能会带来“吉”的结果，“恶”必然会带来“凶”的结果，因此，道德的“善恶”与战略主体要达到的目的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此，王夫之所说的“知事几、察物情”者只是具有理性意识而缺乏道德意识的人。而真正的“知几”必然是“仁智双运”的。

史学漫谈

展的重要判断，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第七，关于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与物质文明建设同等重要位置的思想。习近平同志在《论时代意义》中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之间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不能把精神文明建设“虚化”甚至与物质文明建设对立起来，而应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与物质文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的统一目标，使两个文明建设“两翼齐飞”“双轮共转”，共同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习近平同志书记2015年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他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他特别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

习近平同志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论时代意义》这篇重要文献中阐发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论时代意义》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

的内容”。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向前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在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时代潮头、发思想之先声，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构成了新时代系统性、典范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论时代意义》这篇文献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轨迹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笃信和坚持。例如，他在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就反复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这一辩证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从《论时代意义》这篇文献中找到理论逻辑。

习近平同志书记一贯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高度重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要求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and 改革开放实践的规律性成果。《论时代意义》这篇文献体现出他博大深厚的理论深度和一往无前的创新胆识，也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作者系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